



科举制度与明代诗文的式微

薛 泉

摘要：有明一代诗文式微，科举制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士人进士及第前绝少涉猎诗文；其二，科举制度下文士写诗作文颇为尴尬；其三，时文流弊浸及诗文写作。当然，这主要就成化、弘治以后的情形而言。成化、弘治以前，情况稍好些，因为明代科举行程式有一个发展过程，其对诗文影响应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关键词：科举制度；明代；八股；成化；弘治

有明一代诗文的衰微，一方面是由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科举制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科举制度究竟是如何造成明代诗文式微的，本文拟从三个层面加以探析。

一、士人进士及第前绝少涉猎诗文

对一般士子而言，入仕是出人头地的重要方式，也是自身价值的体现。科举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最重要的途径，明代选官尤重之：“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①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调节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士人趋之若鹜，形成明人热衷科举的独特文化现象。庄昶《送戴侍御提学陕西序》云：“今之世，科举之学盛行，求者曰是，取者曰是，教者曰是，学者曰是，三尺童子皆知科第为荣，人爵为贵，一得第者辄曰登云，辄曰折桂，辄曰登天府，欢忻踊跃，鼓动一时，自童习以至白纷，率皆求之，殫竭心力，必获乃已。”李东阳《应天府乡试录序》亦云：“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之愿仕者，挟经而抱艺，虽遐陬僻壤，衡鉴所在，皆起而趋之。”如此以来，只要是有意仕进者，不管愿意与否，皆需研习时文（八股文）。正如吴宽《送周仲瞻应举诗序》所言：“既以科第为重，则士不欲用世则已，如欲用世，虽有豪杰出群之才，不得不此之习。”“故凡称有志于天下者，不得不由此焉出。”吴氏所论，主要就有追求的“有志于天下者”而言，至于一般士子更是如此。

有些人即使不甚热衷仕宦，迫于当时热衷科举的风气，也不得不把进士及第当作自己的人生要务来完成。袁中道《与四弟五弟》有言：“卑卑一第，聊了书债……我望五之年，得此一第，已足结局。意在闲适，不乐仕进，便欲从此挂冠，遍游天下山水，何往不乐？”

如此一来，凡有意仕宦者，中式前以场屋之业为重，所习多以时文为重，绝大部分精力耗其中，古文歌诗少有涉猎。在学校，他们主要学习举业，研习时文。王世贞《与陈户部晦伯》即称：“甫离塾即从事于学官，顾其所习，仅科举章程之业……至鸣玉登金，据木天藜火之地者，叩之自一二经史外，不复知有何书，所载为何物，语令人愤愤气塞。”其它书籍就很少知道了。在家里，也以举业为重。中式前，杂书很难寓目，即使自家藏书丰富。宋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选举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5～1696页。

懋澄《悔读古书记》云:

始余先人蓄古今籍甚备……余兄濬父课余制举业,一切古今书皆秘之。年十一,始习《春秋》,读《左氏》,窃向书肆,欲购《韩昌黎全集》,误得《韩非子》以归,喜其文词,每篝灯读至子夜。又二年,窃《史记》,卒業未半,辄为藏书老奴索去。会有以《唐诗选》见遗者,得之如得醍醐,朝夕朗诵,与天籁相和,于是始成吟焉,时年十五矣。自是害举业之事不一,而诗与古文词居半焉。

宋懋澄家“古今籍甚备”,为了使其专心应付科考,兄长濬父将竟其全部秘藏。家中仆人也参与监督,一旦发现他阅读与举业无关的书籍,立即没收。如果不以科考为中心程课子弟,长辈会发现会批评纠正的。田艺衡《谈诗初编》载:“郑奕以《文选》教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读《孝经》、《论语》也,免学沈、谢,嘲风咏月,污人行止。’”在明代,《文选》被视为与举业无关的杂书,郑奕之兄是怕侄子因学《文选》迷上写诗,影响举业,才如是说。“嘲风咏月,污人行止”,不过是借口而已。有人甚至因此终生无精力涉足诗文。李东阳《括囊稿序》即云:“夫士之为古文歌诗者,每夺于举业,或终身不相及。”王世懋《冯元敏西征集序》亦云:“科举之学,贤豪自没,故有明经青紫,干禄字书,终身涸溺于其中,而摇手不敢一道古人语者。”因“夺于举业”,士子登科前多不知古诗文辞。《文选》这样的著名选本,很多人都生平未闻。田艺衡《谈诗初编》云:“昔人言‘《文选》烂,秀才半’,盖《选》中自三代,涉战国、秦、汉、晋、魏六朝以来,文字皆有可作本领耳。在古则浑厚,在近则华丽也。嗟乎!今之能学举子业者,即谓之秀才。至于《文选》,则生平未始闻知其名,况能烂其书,析其义乎?虽谓之蠢才,可也。”在这种环境下,士子很少有机会读到举业外的书籍,更不用说研习诗文。正如湛然《少室山房集序》所云:“明兴,以帖括俳偶之文笼士,不复知有古文词。”宋濂《孙伯融诗集序》亦云:“自科举之习胜,学者绝不知诗。”此处所谓“不知诗”,主要是指不懂为诗之道。宋氏之言,虽有些绝对化,但也不无道理。进士及第前不知诗、不能为诗者,毕竟大有人在。如罗璟“自习举子业至登科,不知何谓之诗”^①。万历十三年(1585),王世懋福建校士,泉州漳州间诸生,竟无一人以诗应对^②。归有光终身不能为诗,主要原因也是累于举业^③。

有人即使有时间精力,喜好诗文,也多无师承,主要靠私下自修。徐献忠《笠江先生集序》云:

我朝取士,罢黜词赋,不以列于学官,学官弟子鲜从所习业,间习之,亦无所师承,各以其资所近者为家。

无所师承,也就不可能得到师长的指导,按照个人喜好学诗,主要靠自己揣摩。况且,“间习之”,多数也是不敢公开的。在时人眼里,从事古诗文词写作会妨碍举子业,是旁门左道。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云:“余十五时……是时畏家严,未敢染指。”吴宽《容庵集序》云:“乡校间士人以举子业为事,或为古文词,众辄非笑之曰:是妨其业矣。”李攀龙《送王元美序》亦云:“及见能为左氏、司马文者,则又猥以不利于时制,徒蔽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读之语,且安所用之?”袁宗道《送夹山母舅之任太原序》回忆道:

余为诸生,讲业石浦,一耆宿来见案头摊《左传》一册,惊问是何书,乃溷帖括中?一日,偶感兴赋小诗题斋壁,塾师大骂:“尔欲学成七洲耶?”吾邑独此人能诗,人争嫉之,因特举为诫。故通邑学者,号诗文为“外作”,外之也者,恶其妨正业也。至于佛、《老》诸经,则共目为妖书。而间有一二求通其说者,则诟之甚于盗贼。

偶而感兴赋首小诗,便为塾师大骂,且一邑引之为诫,孰敢再为之。至于佛老类的书籍,更被视为“妖书”,偶有“一二求其通说者”,时人诟之有甚于强盗。绝非公安一地如此!顾炎武回忆自己少时见闻,尚称:“余少时见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以为必不得颺业于帖括,而将为坎轲不利之人。”^④学习诗文会遭父师训斥,被视为“坎轲不利之人”。既然如此,还有多少人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文徵明《东潭集序》即云:“惟我国家以经学取士,士苟有志于用世,方追章逐句,规然图合有司之

① 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441页。

② 王世懋《王生诗序》云:“乙酉来,校士闽越,所过泉、漳间,文士愤起郁兴,人操战笔,而求之诸生中,竟无以诗应者。”见王世懋:《王奉常文集》卷之七,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284页。

③ 梅式庵语云:“就中晚登科第者,只归熙甫一人。然古文虽工,终不脱时文气息,而且终身不能为诗,亦累于俗学之一证。”见袁枚:《随园诗话》卷七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224页。

④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36页。

尺度，而一不敢言诗。”陈子龙遭遇也是如此。他喜好乐府、古诗，只能偷偷摸摸地学。其《仿佛楼诗稿序》称：“而是时方有父师之严，日治经生言，至子夜人定，则取乐府、古诗等拟之，疾书数篇，要之以多为胜，以形似为工而已。藏之笥中，不敢示人也。”在喜好诗文的士子中，还有一种人，欲时文、诗文兼顾，时常处于矛盾中，也没有多少空暇或心思研习诗文。

二、科举制度下文士写诗作文颇为尴尬

对于喜好诗文的士人来说，科举制度下为诗作文，是相当尴尬的。因惧怕来各方的压力诗文写作转入地下，就是最好的明证。除此以外，还有三种情形值得关注。

其一，既想走仕途，又怕时文浪费精力。有些士子，欲时文与诗文兼顾，最终却未做到，致使自己的诗文潜能未能得以发挥。张弼《梦庵集序》云：

古之为诗也易，今之为诗也难。何哉？商、周、汉、魏弗论已，声律之学，至唐极盛，上以此而取士，士以此而造用，父兄以此教诏，师友以此讲肄。三百年间，以此鼓舞震荡于一世，士皆安于濡染，习于程督。稍自好者，率能为之，为之者不亦易乎？沿及宋、元，犹以赋取士，声律固在也。我太祖高皇帝立极，治复淳古，一以经行取士，声律之学，为世长物，父兄师友摇手相戒，不惟不以此程督也，为之者不亦难乎？

所以为诗“古易今难”，是因士子没有足够的时间练笔。诗歌如此，古文亦然。这类士人欲分出一部分精力从事古文辞，又担心举业荒疏；欲将古文辞引入时文，又恐时文斑杂。正如王世贞《彭户部说剑余草序》所云：“欲分功于古文辞，则其业疏；以古文辞间之，则其业杂。”不管愿意与否，一旦从事举子业，士子们必定没多少空暇或心思研习诗文，这不能不妨碍诗文写作。袁中道《花雪赋引》称：

予少时亦喜作赋，然每成，辄惭恧不敢出，其不如伯孔甚远。中年游两京，意欲追平子、太冲之后，作两京赋，以扬厉本朝之盛，复为举子业夺去。

因举业所累，京都大赋的写作，一再搁置，袁中道深感遗憾。明末曾异撰亦身有同感。其《答陈石丈书》有曰：

每阅墨艺房书，或拈题课义，辄有弃日之叹，以为前世司马子长、杜甫诸君，何幸而不为此？彼亦人耳。使我无科举之累，得肆力于文章，固未能胜之，亦未必尽出其下。以此为应制帖括事，每一举笔，辄谓我留此数点心血，作一篇古文辞，数首歌行，直得无拘无碍，而又庶几希冀于千百年以后。何苦受王介甫笼络？如此意况，似于富贵功名一道，极相嫌恨，虽未甘谢去巾衫，飘然为隐士逸氏，又似不可强。

曾氏之言，还是比较客观的。或如其言，若无时文之累，其为文水平或定会层楼更上。既想走仕途，又晓得为时文浪费精力，诗文潜能因此未能发挥出来。这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士人的心声。

其二，为尽早及第，半途而废，自动放弃诗文。有的人科举之余，不废诗文写作，但后来权衡利弊，为早日折桂，自动放弃。隆庆三年（1569），俞宪为其子刻《续俞伯子集》题识云：“长子渊素业儒，虽屡蹶场屋，而课程之暇，辄事吟咏。余喜其不羁也，尝为刻诗篇以诱其进。越数年，则专意课程，无意篇翰矣，岂其急于进取而忘性情之学若是耶！”俞宪因深受科举之害，对儿子要求不甚严格，态度也较开明。其《俞二子集》卷首题识云：“余素为科目所苦，雅不欲其急功名，趋利禄。凡余游历仕路二十年，未尝以二子随。间有便归，亦未尝一程其课业。”尽管有父亲理解与支持，环境较宽松，但在科考重压下，他还是主动放弃诗歌创作。主动放弃不等于自愿放弃，知子莫若父，“岂其急于进取忘性情之学若是耶”，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个中原委。徐中行《叙邵长孺诗》亦云：

长孺少受掌故《尚书》，念母寡老贫，而不卒业。渡大江、客淮汉，而游梁、游燕，缘诗而抒其忧思之怀，何所求闻？乃物色者竟以诗名长孺。黎惟敬见而竦然异之曰：“美哉！安所得闻《召南》之音乎？”亟称之辇下，名駸駸起。长孺谢去，谓：“今士以急经术贵，奈何有邵生顾以不急之业取世资耶！”遂鼓篋以胃子游。翩翩称司成高第，悔其少作若敝帚已。

邵长孺虽有诗名，但把诗歌视为“不急之业”。他认为，诗歌能赢得一时声誉，终非安身立命之计，当务之

急是科举及第,于是主动放弃诗歌,专攻举子业,终于博得高第。而且,他已悔其少作。不管主动放弃,还是被动不为,都是废而不为,严重影响到诗文写作。

其三,及第后为诗作文也非常坎坷。一般而言,士人及第后方有余暇从事古诗文写作,这是所谓的先急后缓,先重后轻。邵长蘅“今士以急经术贵,奈何有邵生顾以不急之业取世资耶”之言,已经道明。王慎中《陆龙津诗集序》亦云:“方今号为黜诗赋、尊经术,士亦必以经术收其科发身,然后习为诗赋,其轻重不同,亦制使之然也。然必收其科发身后习为诗赋者,乃可以钩誉射声,为世所述。其不能收其科者,虽善为诗赋,世亦莫赏也。”殊不知,士子一生最宝贵的时光已倾注于时文,加上平时缺少诗文基本功训练、受早期思维定势左右,故及第后往往难以写出高水平的诗文。王世贞对此认识清醒,《彭户部说剑余草序》有言:“诸生之业……加之以岁月磨而耗之,甫得一官,有余晷,始欲呻吟以从事古之作者,而不知其精已销亡矣。”钱谦益《复徐巨源书》亦谓方希古:“自少及壮,举其聪明猛利朝气方盈之岁,耗磨于制科帖括之中。”看起来是个别案例,实是普遍现象。《四库全书总目·许仲斗集提要》括之曰:

盖明自正、嘉以后,甲科愈重,儒者率殚心制义,而不复用意于古文词。洎登第宦成,精华已竭,乃出余力以为之。故根柢不深,去古亦远。

再说,士人入仕以后,即使有诗才、有精力,也不见得能心安理得为之,他还要面对各种压力。一方面,公务繁忙,难以有闲暇静心为诗文。文徵明《东潭集序》云:“既仕有官,则米盐法比,各有攸司,簿领章程,日以困塞。非在道山清峻之地,鲜复言诗;而实亦有不暇言者。”另一方面,做诗无用,为诗妨政的论调,还很有市场。为官以后,理论上说,可以名正言顺地写作诗文,但实际上还要时常面对长辈警告、同僚相戒。弘治年间,陆深中进士后去拜访刘健。刘教之曰:“好笑后生辈,才得科第,却去学做诗。做诗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两个醉汉。撇下许多好人不学,却去学醉汉。”陆深虽谓刘“抑扬之间不能无过”,但还是承认其“意则深远”^①。王世贞在刑部供职时,“朝士业相戒毋治诗,治诗即害吏治”^②。何良俊《唐雅序》亦言:“世有谓诗者无益于治,天子在上可无用诗。”在这种氛围中,写诗还是有压力的。压力归压力,士子进入仕途后,出于各种目的,还是要习作诗文的。但因先天不足、“根柢不深”,渔猎前人韵语,抄袭、模拟前人之作,自然不难理解。屠隆《涉江诗序》即云:

今之士大夫则不然。当其屈首授书,所凝神专精止于帖括,置诗赋绝不讲。一朝得志青紫,孳孳而程簿书功令,偶一念及,曰:吾都不习吾伊,人将伦父我,我其稍染指哉!于是略渔猎前人韵语一二,辄奋笔称诗,辄托之杀青,论之都市,鹭者却步,赞者争前,乌知薰莸黑白耶?

这样看来,明代诗文拟古,也与科举制度有一定关联。关于科举制度下明代诗文的不振,袁中道现身说法,有一段精彩表述:

吾所以不及古人者有故:少志进取,专攻帖括;中年尚遭摈斥,竭一生精力,以营笺疏。避孽迎笑,至于梦肠呕血。四十以后,始得卑卑一第。博古修词,偷晷为之。本不仗习,何由工巧;浮涉浅尝,安能入微。此其不及古人者一也。古人诗文,皆本之《六经》,以溯其源;参之子史百家,以衍其派。流溢发满,中弘外肆。吾辈于本业外,惟取涉猎,一经不治,何论余书?^③一生大部分精力“专攻帖括”、“营笺疏”。至于古诗文词,只是忙里偷闲私下为之;除举业之外,一经未通,无论其他书籍,文学涵养不够。如此,怎能企望诗文工巧?此虽就个人而发,但意义普遍。

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士人无论及第前,还是为官后,写作诗文往往一直处于一种尴尬、被动境地,不得肆力于诗文。这极大地降低了明代诗文的创作质量。

三、时文流弊浸及诗文写作

雪莱《伊斯兰的起义序言》说:“在任何时代,同时代的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

①陆深:《俨山外集》卷十四,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74页。

②王世贞:《弇州续稿》卷四十三《山泽吟啸集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563页。

③袁中道:《珂雪斋集》卷首《珂雪斋前集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9~20页。

决于他们的主观意愿。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①士人专习时文，无暇也不敢从事古诗文写作，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诗文创作必然会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迷恋时文风气的影响。时文流弊浸及诗文写作，可从以下几方面见之。

其一，模拟剽窃，不见真情。明中后期的科举考试，名义上是三场，实际上初场的《四书》义、经义，起决定作用。这种制义在行文上还表现出很强的因袭性、模拟性。顾炎武《日知录集》卷十六云：

国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后而无重轻。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

黄汝成引钱大昕语亦云：“乡、会试虽分三场，实止一场。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四书》文行之四百余年，场屋可出之题，士子早已预拟。每一榜出，钞录旧作，幸而得隽者，盖不少矣。”^②科考题目内容狭窄，多源自《四书》，日久天长，可出的题目，士人多已心中有数。他们或“窃他人之文记之”，或事先拟定一些题目，套用他人格式，用心模拟而出。在考场上“抄誊一过”，就有可能侥幸中式。这样，在明代复古文化背景下，“近时”的宋代策论，成为抄袭、模拟的主要对象。杨慎《文字之衰》称：“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谈性命，祖宋人之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当然，抄袭宋论也是有选择的，明人尤其青睐三苏之文。田艺衡也指出：“近时俗学，皆尚三苏文字，不复知有唐文矣，况秦、汉乎？故不拘大小试卷，主司大率批曰：‘宛然苏子口气。’或曰：‘深得苏轼家法。’即中式矣！”^③王世贞《苏长公外纪》亦云：“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而其所撰论策之类，于时为最近，故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平时无暇训练，又束书不读，文学素养低下，急功近利地模仿三苏古文写作时文，自然是流弊滋生，万不得已。

那么时文究竟有哪些流弊呢？吴宽《送周仲瞻应举诗序》有言：“今之世号为‘时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对偶，率腐烂浅陋可厌之言。甚者指撝一字一句以立说，谓之主意。其说穿凿牵缀，若隐语然，使人殆不可测识。”王世贞《风土序录》亦云：“世之小公车业者，谓经生之文多割饰，而于圣人垂世之训无所发；论策士之文多剽括，而于圣人经世之用无所补。”由此到少可捕捉到以下信息：形式上，时文讲究格律对偶，格式僵化死板，语言多“剽括”，陈腐可厌，极大地阻碍了内容表达。内容上，时文必须依照四书五经中朱熹的注解，代圣人所发“主意”，“文多割饰”，多不能发表自己的见解，故多牵强附会，难于理解，于世无补。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上，八股文“不过剽窃儒先之绪，而微短订组织之”^④。这在很大程度上僵化了士人思想，扼杀了其创造力，对诗文创作负面影响甚大。无暇顾及诗文者自不必言，即使有精力从事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受时文行文规范的影响。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一即云：“世之学举业者，牵于义理，狃于穿凿，于风人性情声气，了不可见，而诗之真趣泯矣。”这是说，八股文“牵于义理，狃于穿凿”的弊病，波及诗歌写作，使之不见真性情。明人郎瑛所记一则故事，亦颇能引人思考：

国朝罗璟，江右人也，自习举子业至登科，不知何谓之诗。后考庶吉士学士，试以《秋官怨》，默然无所答。遍问同考者，同考对以韵脚、起结、联对如此，然后即作一诗。^⑤

这是典型的以时文为诗的例证。按照时文路数写诗，诗道焉能不衰！时文对古诗文创作影响之深，可见一斑。吴乔尖锐地批评道：“诗与古文，门径绝异，时文于二者更异。彼既长于时文，即以时文见识为古文诗，骨髓之疾也。”^⑥

其二，注重理道，鄙视修词。八股文流弊对明代诗文的另一不良影响，是为文太重理道，不重词彩。

① 雪莱：《伊斯兰的起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6页。

②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之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45页。

③ 田艺衡：《留青日札摘抄》卷四，载《丛书集成新编》第88册，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142页。

④ 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五十五《彭户部说剑徐草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719页。

⑤ 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441页。

⑥ 吴乔：《围炉诗话》卷之六，《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82页。

许学夷“世之学举业者,牵于义理”之论,初步点明此问题。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曰:

以余观于文章,国朝作者,无虑数十家称于世。即北地李献吉辈,其人也,视古修辞,宁失诸理。今之文章,如晋江、毘陵二三君子,岂不亦家传户诵?而持论太过,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胜相掩,彼岂以左邱明所载为皆侏离之语,而司马迁叙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而结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后生学士,乃唯众耳是寄,至不能自发一识,浮沉艺苑,真为相舍,遂令古之作者谓千载无知己。

这主要就文章而论。宋儒为文鄙视文词,以为文害道,明代理学家沿承此习。李攀龙所驳,即在于此。唐宋派“持论太过”,“惮于修辞,理胜相掩”,伤害了文章高古气格,阻碍了“理”的表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人长期从事八股文制作,其他书籍少有寓目,多缺乏必要的文学修养。为藏其拙,只好以谈理道为托辞。就如王世贞《赠李于鳞序》所云:“古之为辞者,理苞塞不喻假之辞。今之为辞者,辞不胜跳而匿诸理。”王世懋《冯元敏西征集序》亦云:“或畏难逃之理窟以自解。”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多是成化、弘治以后的情形。之前的情况稍微好些。明初,科举制度刚实施不久,措施尚未完善,制度不甚严格,其对文学的影响,不可与后世同日而语。在考察明代诗文衰微科举制度应承担的责任时,不应忽视其阶段性。这就不能不谈及八股文定型的时间问题。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称:“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袁中道《淡成集序》亦谓:“举业文字,在成弘、间,犹有含蓄有蕴藉。至于今,而才子慧人,蜚英吐华,穷其变化,其去言有余而意不尽者远矣。”可知,在成化、弘治以前,八股文的程式并不甚严格,尚讲究含蓄蕴藉。特别是天顺以前,其形式相对自由,尚没硬性规定非用对偶不可。再者,明前期不少士人虽以时文为务,但亦能研索六籍,兼习诗歌、古文。《四库全书总目·震泽集》称:“盖有明盛时,虽为时文者,亦必研索六籍,泛览百氏,以培其根柢,而穷其波澜。”故当时不少人“时文工,而古文亦工也”。当然,这主要就明前期一般情况而论。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Poetry and Prose in Ming Dynasty

Xue Quan (Professor,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should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decline of poetry and prose in Ming Dynasty. From a literary perspective, the effect mainly exists in three aspects: First, Shiren rarely write poetry before they become *Jinshi*; Secondly, unde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tellectuals writing poetry is very embarrassing; Thirdly, the shortcomings of *Baguwen* have a bad influence on poetry and prose. Of course, this mainly exists in Chenghua and Hongzhi years later. Previously, the situation is slightly better. Becaus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Ming Dynasty, the program has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ts impacting on poetry should be analyzed concretely.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Ming dynasty; *Baguwen*; Chenghua period; Hongzhi period

● 作者简介: 薛 泉,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海南 海口 571158。

● 责任编辑: 何坤翁

